

《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

13位ISBN编号：978730126612X

出版时间：2015-12-1

作者：方诚峰

页数：32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

内容概要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北宋哲宗、徽宗朝（1085-1125）的政治史。为避免将政治史简化为政治斗争史，本书从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入手，重新梳理了北宋晚期纷繁复杂的政治演变过程，进而试图理解中国古代王朝政治的特质。首先，全书始终围绕宋代“士大夫政治”这一大主题，说明其多层次的理想在北宋后期政治实践中逐渐异化的过程，而前人多所强调的党争、腐败等北宋晚期的政治困境，就是这一异化的副产品。其次，本书从技术与观念的层面，说明了帝制政治在北宋晚期展现的弹性与多元性，而非某种固定的趋势，这也是为了跳出泛论君权强弱大小的思路，寻找理解王朝体制的新方式。

《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

作者简介

方诚峰，1980年生，浙江淳安人，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代表论文为《“文字”的意义》和《祥瑞与北宋徽宗朝的政治文化》。

书籍目录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元祐政治路线的确立

第一节 从元丰到元祐

一、熙丰臣僚

二、异议之人

三、高氏的立场

四、本节结语

第二节 司马光的政治主张

一、君主作为政治秩序的核心和变革的起点

二、英宗朝的老、新问题

三、神宗朝的难题及应对：政体与得人

四、元祐更化与司马光的设计

五、本节结语

第三节 垂帘体制的确立

一、从熙宁到元丰的中枢

二、元祐三省：同取旨、聚议与“三省事通为一处”

三、平章军国重事、平章军国事

四、垂帘仪制与垂帘体制

五、本节结语

第二章 元祐政治的展开与危机

第一节 元祐诸“党争”的再剖析

一、苏轼与程颐

二、言事官之党、韩维之党

三、车盖亭诗案

四、本节结语

第二节 绍述前夜

一、宰执的态度

二、高氏的部署

三、何人首倡绍述？

四、主流政治文化

五、本节结语

第三章 哲宗亲政与政治文化的嬗变

第一节 哲宗赵煦的经历及其意义

一、圣学：经筵之外

二、皇后：从孟氏到刘氏

三、疾病、子嗣与臣僚

四、本节结语

第二节 “文字”与新旧问题的“终结”

一、重修《神宗实录》

二、编类章疏与看详诉理文字

三、政治整顿与“土类”之变

四、本节结语

第四章 徽宗朝的权力结构

第一节

“公相”蔡京

《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

- 一、“公相”的出现
- 二、“公相”蔡京与三省宰执
- 三、从联金灭辽之议看蔡京与枢密院长贰
- 四、徽宗朝权力结构的调整
- 五、本节结语
- 第二节 御笔、御笔手诏及其政治意义
 - 一、御笔与内批
 - 二、手诏
 - 三、御笔手诏
 - 四、御笔、御笔手诏的政治意义
 - 五、本节结语
- 第五章 徽宗朝的“应奉”
 - 第一节 应奉的缘起与目的
 - 一、徽宗朝应奉之起
 - 二、政和以降的诸工程
 - 三、“惟王不会”与“丰亨豫大”
 - 四、本节结语
 - 第二节 从应奉局到应奉司
 - 一、应奉的两个系统
 - 二、应奉财政系统的独立
 - 三、本节结语
- 第六章 道教、礼乐、祥瑞与徽宗朝的政治文化
 - 第一节 “道家者流”
 - 一、崇观诸方士
 - 二、政宣道流与徽宗君臣
 - 三、本节结语
 - 第二节 礼乐与祥瑞体系
 - 一、徽宗苑囿
 - 二、礼乐之器
 - 三、本节结语
- 全书结语
- 附录一：关于曹氏、高氏反对新法几条材料的辨析
- 附录二：参考文献

精彩短评

- 1、制度如何安排，统治者都有其政治上的深层考虑。
- 2、不能给赞誉再多的一本书，我理想中的政治史是什么样，这本书给出的政治史就是什么样的。
- 3、膜拜
- 4、好像都不错,合在一起就差了那么点.
- 5、作者的逻辑非常清晰，读的过程非常顺畅，只是一合上书才恍然觉得自己已经被作者牵着走了这么远.....
- 6、将司马温公的政治哲学和政治理念细致铺展，才见其与王荆公之分歧。“丰亨豫大”一节亦是今世镜鉴。
- 7、近年来关于北宋政治史研究最秀的成果之一，作者在尝试用自己的历史解释模式来走出传统的“新旧”、“阶级”论说模式，新意迭出，多有创见。
- 8、确实很牛。庆历变法应该是对祖宗之法的一种反动？（宋史小白瞎理解）熙丰变法才是重大变革。哲宗和徽宗两朝处于“后变革时代”，分别对熙丰变法作出自己的回应。哲宗朝大家养符合道德的仓鼠。徽宗朝试图塑造“神学王”的努力，包括祥瑞（以及安置珍禽异兽的艮岳所用的花石纲）、天书、道士、新订诸礼（政和五礼难道是由于这个动机）、礼器制作等等都是。但是因为北宋的儒学复兴运动，神学王的塑造并不能得到制度和舆论的支持。方老师借此对传统的北宋政治史的皇权概念的大而化之的传统论断提出了挑战，认为应当进一步细分权力和权威，分别考虑权力运作的技术和皇权理念的形塑。
- 9、部分内容原来读过论文，再读之下冲击感不强。但是线索清晰，重点突出，尤可称赞的是作者做的解释都会很妥帖，可见平时用功之勤。
- 10、北宋哲宗、徽宗朝的中央政治史，对变法——更化——绍述路线的演变进行了梳理，并论述了徽宗朝“神性君主”的建构。没有涉及此期政治体制与北宋迅速崩溃间的关系是一遗憾。旧党或者清流都是嘴炮王，一个想法，不一定对。另外，文字实在太粗糙了。
- 11、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为何排版字给印这么小！
- 12、路人转粉
- 13、每一个部分单独看都非常有启发。前后两半写法略有不同。对丰亨豫大和道教礼乐祥瑞的两部分印象很深。政治理想及其异化这一条线写得真好！
- 14、方诚峰老师此书已读完，历时整一周。书中创新之处屡见不鲜，如元丰时期中枢改革的意图，由章疏编类看士大夫政治的崩坏，关于“丰亨豫大”的理解，徽宗制礼乐与造祥瑞的意图等。对比其博士论文，可知其间的进步除研究时段的延伸外，更有思考的深入与脉络的拓展。总之，方老师在这本书中试图构建自己对于北宋晚期历史的解释体系，虽然会有欠缺，但非常值得一读，相信此书对之后的政治史研究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 15、论神宗以来政治实践的异化
- 16、方主任的书读起来简直怎一个爽字了得
- 17、可以读
- 18、小书小圈子，一水的四星。
- 19、并不能视为关于“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的通论。司马光的主张很有趣，想起来宋代君主专制体制的加强和“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是一体的。司马光那么强烈的要求君主乾纲独断，这个是针对新党的个例，还是一种普遍的主张？
- 20、政治體制剖析得當，條理清晰；政治文化行筆流暢，不作墜語。近來涉及政治史不可多得的好書！
- 21、宋徽宗的征途是星沉大海
- 22、全书着眼于北宋晚期政治体制的分析和政治氛围的解读，对后神宗时代的政治体制、权力高层运行模式的勾勒清晰明了，但对北宋中期儒学复兴与北宋晚期政治理想、实践之间关联解释略显单薄，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在北宋朝是如何呈现的，题有剩义
- 23、从政治文化，而非简单的利益集团斗争去理解北宋晚期政治。很透彻，很有启发。哲宗看得我好心疼，下一步准备看看曾公遗录

《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

- 24、北宋后期的政治史，长期纠缠于新旧党争和政治腐败的论调，相比而言，这是本“走出新旧”的政治史著作。前三章基本按照时间脉络叙述哲宗朝政治史演进，层层递进，相互联系比较密切。后三章选择政治结构（公相、御笔）、应奉、祥瑞等三个重要问题来描述徽宗朝政治的特色。注重政治理想的层次、落实与异化，最后认为：皇权是宋王朝这个政治体当中最后的不确定项，试图从中概括出皇权的某种固定趋势，无论在权力的现实层面还是观念层面，都是难以成立的。对于理解北宋后期的政治史，有很大帮助。
- 25、里面的“丰亨豫大”那节最好！
- 26、作者一直在提到尽力避免“庸俗的”政治史，但写出来好像有点变味儿了，看来政治史还是得“庸俗点”，
- 27、比较好的厘清了北宋后期政治的演变。政治理想与政治现实之间，君主与士大夫的权力关系等影响了具体的措施逐渐背离了原初的政治设想，最终导致危机与崩溃。而关于元佑政治确立，哲宗的颠覆，徽宗的祥瑞道教的政治文化都有比较深入的解释。打开我对宋代政治，皇权，儒学复兴思想等的兴趣之门，推荐
- 28、胜见迭出，给予我许多启发，也愈发坚定了之前的一些思考。是近期读过的最优秀的北宋晚期政治史的研究著作。这是否也可以看作学界的新风向？PS：已经通过听雨楼老丝向方诚峰先生表达过景仰之情啦！
- 29、单章看，几个细节问题处理的都很好，整体看，则有些单薄，在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两个主题上的阐述都有待深入，比如，政治体制对军事这一核心问题的阐述就过少，而政治文化，没有注意到徽宗的“圣君”模式是对真宗“天书”模式的继承，而这一政治举措，不仅是针对内政，更多的可能，是针对外交～
- 30、膜拜！作者行文从容不迫，长于理论化表达，尤其令人佩服！
- 31、非常不错，反驳党争视角的事后诸葛亮的结论，第一章第一节司马光的难题，经历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初期四朝，司马光遇到难题以及他的解决路径，仁宗英宗神宗初期强调君主的重要性，突出君主有为自做决断，到神宗朝终于实现，但君主有为之下却不符合己意，故强调政体的系统化与任用合适的人才，但只是纸上谈兵无法在神宗朝实现，到哲宗朝初期因为废除新法撕逼才真正践行了开言路的主张，新法的副作用也在这种体制下被纠正。总体来讲，司马光虽然一辈子大部分时间在放嘴炮，我倒是认为他思考的还是很认真，也在应映皇帝的变化调整自己的主张，哲宗朝初期还是实现了他终其一生不断深化的政治设想，司马光其实也一直抓住了问题的核心——君主应该做什么，但问题关键是在于他常年未参与一线的地方行政，所以绝大多数时间干的事情用处都有限。
- 32、结语写得贼好。
- 33、读的第一本宋史专著（读书少）。作者的前言部分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以及各章节的结论部分与最后总论都向读者展示出了作者的思维强度，第三章第二节对哲宗朝政治文化嬗变的论证，令人深感精彩。没有给五星，可能是因为觉得作者具体展开的论证过程，以及行文构思上还不够精巧，这与作者在前言和结论中所表现出的思维强度有所落差。
- 34、从政治理想之异化而非新旧党争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北宋晚期的政治史；个人尤其喜欢对司马温公政治理论之梳理以及应奉司与南宋经总制钱传承关系的部分。
- 35、对于我这样记忆力不好理解力又差的人，这种有每一小节都有引言和结语的书看起来简直太爽了！这书在很多方面都给我启发，公相、丰亨豫大、御笔这几节尤其突出。最后结论中关于政治理想异化的部分，简直醍醐灌顶啊！对高氏有了重新认识。

1、方诚峰新著《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2015年12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共30万字。宏观阐述与微观考究相结合，从政治文化、政治体制、政治实践三个维度对北宋晚期纷乱复杂的政治演化进行了新的诠释和系统的梳理。对于北宋晚期的政治史，学界虽然已经有了相当多的研究成果，但长期纠缠于新旧党争和政治腐败的论调。是书试图从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入手，分析北宋晚期君臣的政治原则与其在政治实践中的分合，从而寻找解读王朝体制的新方式。全书围绕政治文化、政治体制与政治实践的相互作用展开研究。从政策选择、理论主张、垂帘体制三个层次，介绍了元祐政治路线的确立与内涵；探讨了元祐政治路线在实践过程中遇到的危机及其实质；从君主和士大夫两个角度探析哲宗亲政时期政治文化的质变；从权力的实际操控和象征意义两个层面探讨徽宗的君主角色；讨论徽宗朝“应奉御前”的缘起和实质；从道教、礼乐、祥瑞三个方面分析徽宗对自身的历史定位。方著的研究内容从时间上看涵盖了高氏垂帘、哲宗亲政、徽宗统治三个时期。其关注点，由表及里，层层深入。比如《元祐政治的展开与危机》，从北宋晚期层出不穷的“党争”入手，对元祐时期的政治纷争进行了再剖析，从而得出，由于不同的政治诉求，推动了诸“党名”的出现，而并非有实际的政治集团崛起。提出了价值观、权威比现实利益更适合作为研究北宋晚期政治的入手点。反映了作者独到的研究眼光和史料解读能力。方著视角独特、分析精细、史论结合，是近年来北宋晚期政治史研究的一部力作。其书突破了以往学术界对北宋晚期政治史的一般地位，力图寻求一种解释北宋晚期政治史的全新方式。相信该书将进一步推动相关学术问题的深入研究。但是作者把政治理想作为北宋晚期政治演变的依托，似乎忽视了各个执政集团对现实权势的考量。高太后支持所谓的旧党，有其个人的感情倾向，还应该对对个人权力的一种考量或者是对祖宗之法的一种维护。政治理想会在现实权势得失的考量之下而逐渐淡化，甚至消失。

2、何为“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无论是在政治学领域还是历史学领域，这恐怕都是难以具体回答的问题，因为相关定义数不胜数。聚焦到中国古代史研究，回顾近年来有关“政治文化”的论著，可以发现大概有以下两点共识：其一，承认现代政治学理论下美国政治科学传统中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的经典定义：“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情感。”即认为政治文化包括三部分内容：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评价。其二，认为以上定义的政治文化并不适合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在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中，政治文化需要被重新定义。但在共识之下，学者对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政治文化的定义并不一致。最早明确提出以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为研究对象的是阎步克先生，他在《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一书中定义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认为其是“处于政治和文化的交界面上、兼有政治和文化性质的那些有关事项和问题”。陈苏镇先生则进一步诠释了中国古代史研究中“政治文化”的定义。200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陈苏镇主编、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诸位学者参与的《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研究》一书，书中给出的有关“政治文化”的定义是：“它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和特定环境中形成的群体政治心态。”这一定义与陈苏镇先生在《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中对“政治文化”的定义基本一致。而聚焦到宋代的政治文化，不得不提及余英时先生的研究。他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中以政治文化的视角对宋代士大夫群体进行了考察。他所使用的“政治文化”，大致包括两部分内容：政治思维的方式和政治行动的风格。具体到宋代士大夫群体，指宋代士大夫“重建秩序”的政治原则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实践。本书作者方诚峰所使用的“政治文化”，则与以上定义皆有所区别，或者说是在以上定义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作者将前辈学者有关“群体政治心态”的政治文化定义进一步扩展为三个层次：其一，政治理论或主张；其二，政治宣传和口号；其三，以上两点影响下的政治情绪或取向。同时，作者也借用了余英时先生有关“政治原则”和“政治实践”的区分，认为以上三个层次的政治文化不仅是一些政治的“原则”，也始终伴随着实践，从这一角度，书中的政治文化指“政治的原则、相应的政治实践”。需要指出的是，作者所言“政治实践”是相对“政治原则”而言的，而不是确指具体的政治行动。只有明确了书中所论政治文化的具体所指，我们才能进一步对书中所论北宋晚期的政治文化进行考察。作者的论述由哲宗初期所谓“元祐政治路线”而起。在作者的论述中，“元祐政治路线”由政策选择、理论主张、垂帘体制三个层次而实现。这样看来，“元祐政治路线”由两部分组成，其一是承载路线运作的政治体制，即“垂帘体制”；其二是路线背后的所谓“政治文化”，即这一政治路线背后的政治原则及政治实践。作者认为，“元祐政治路线”选择否定丰熙之政，而贯彻司马光的理论主张：恢复一个有效的政治体，在这一政治体中，有着理想的君主和合理选择后产生的

各级臣僚，臣僚之间可以存在相悖的意见，以保证宋王朝平稳存在，决策不至于出现致命错误。在这样的理论主张下，“元祐政治路线”的政治实践主要有二：其一，“安静”的政策倾向；其二，“激进”的群体混同倾向。“元祐政治路线”的政治文化深刻影响了这一时期的政治体制，即垂帘体制及体制下的政治行动。元祐年间垂帘体制之等差有序的中枢制度原则，臣僚对苏轼、程颐的攻击以及“车盖亭诗案”都是“元祐政治路线”背后的政治文化影响的结果。然而“元祐政治路线”及垂帘体制最终走向崩溃。除太皇太后高氏去世、哲宗年纪渐长等客观原因外，作者认为，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元祐政治路线”背后的政治文化与北宋中后期以来的主流政治文化是背离的。这里的所谓主流政治文化，主要指北宋中后期以来士大夫的政治理想或者说政治原则。为了说明相关问题，作者引入了“士大夫政治”的概念。在作者的论述中，士大夫政治是一种由皇帝和士大夫群体两个因素结合而成的政治形态。北宋晚期的士大夫政治有着其特殊的政治文化。概括这种政治文化，首先是经过一系列思想运动之后，士大夫群体产生了重建上古圣王的天下秩序的最高政治理想，这一政治理想具体成为两个方面，可以用“致君尧舜”和“一道德、同风俗”两个政治口号来概括。“致君尧舜”针对的是皇帝，要求将皇帝塑造为理想的上古圣君；“一道德、同风俗”针对的是士大夫群体内部，要求士大夫群体内部实现意识形态的统一。要求变法革新、恢复圣王之制的丰熙之政的出现，无疑顺应了这种政治文化。而回顾“元祐政治路线”，其稳定王朝统治的政治原则和“安静”的政策倾向都是与主流政治文化背离的。于是在垂帘体制崩溃之后，朝廷的大部分中高级文官士大夫要求“绍述”，便不难理解了。哲宗一朝后半期，士大夫政治形态及其主流政治文化冲垮了“元祐政治路线”，自身却也走向失败。作者的论述由上述主流政治文化具体体现的两方面、即皇帝和士大夫而展开。我们可以看到，“致君尧舜”的理想在“元祐政治路线”崩溃后便走向失败，成年后的皇帝没有如士大夫所预设的那般符号化、非人格化，正常化后的皇帝体制也并非垂帘体制那般可以给予士大夫“致君尧舜”的机会。而在士大夫群体内部，“一道德、同风俗”的政治理想口号化，并在政治实践中展现为党同伐异、政治清洗和思想整肃。自此，士大夫的面貌被扭曲，高度的责任感不再。经哲宗一朝后，士大夫政治代表的政治文化（核心的政治理想）走向失败，这也意味着士大夫政治的失败。那么，士大夫政治理想的失败对随后的徽宗时期有何影响？这一问题的实质是徽宗时期的政治文化与政治体制的样貌是怎样的。就政治文化而言，士大夫政治理想的失败不意味着与之相关的政治口号的消失；事实上，政治理想失败的同时一系列与之相关的政治口号走向“异化”，异化的政治口号催生出异化的政治实践，也影响了这一时期的政治体制及皇帝、官僚的政治行动。这一系列的异化政治文化现象与士大夫政治理想是背离的。具体到作者的考察，突破口是“丰亨豫大”和“惟王不会”这两个徽宗时期的政治口号。作者指出，“丰亨豫大”与“惟王不会”二者加起来进行概括，其含义是：理想的君主（尧舜之君）、理想的大臣（任天下之事）、理想的统治成效（天下之人豫悦），也就是“极盛之时”。了解到这两个政治口号的含义，那么宋徽宗君臣在政治文化层面以及政治体制层面进行的调整便可以理解了。在政治文化层面，“丰亨豫大”“惟王不会”的政治口号催生了宋徽宗君臣针对皇帝形象和王朝形象的两个面向的政治实践。在皇帝形象方面，要求塑造君主的神圣性，引入道教意识形态，将宋徽宗自身打造为神圣之君；在王朝形象方面，通过建立日常化的祥瑞体系，彰显王朝盛世景象。于是，士大夫政治理想完全变成了形象工程。在政治体制层面，政治文化口号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公相体制”和“应奉制度”。“丰亨豫大”的政治口号及政治指向使得宋徽宗不得不任用善于理财的蔡京，然而宋徽宗同时又忌惮蔡京的政治势力，故而采用了公相体制，在牵制的同时对蔡京进行最大化利用；应奉制度则是为了应对上述政治实践造成的财政问题。除此之外，作者还敏锐地注意到了徽宗时期的“御笔手诏”，指出了其在政治体制内彰显皇帝权力（权威）的作用。笔者认为，作者的这一发现正可以和同一时期政治文化的情况相印证：政治文化层面皇帝的神圣化及政治体制层面皇帝权威的展示是相适应的。通过以上考察，在政治文化层面，作者得出的结论可以概括为：北宋中后期以来形成的士大夫政治理想及其所形成的一系列政治文化在哲宗、徽宗两朝的实践中全部走向失败（或者说异化）。那么，一个必然的追问便是，为何士大夫政治理想会走向失败？作者将其归结到了“皇权”这一“不确定项”。士大夫“致君尧舜”的理想被皇帝抵制，皇帝自身向往的神圣性君主形象却和士大夫的理想背道而驰。

3、读《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有感方诚峰先生的这本著作，是近来宋代政治史领域不可多得的佳作，也是近期邓广铭基金的获奖著作。此书是对北宋中后期的政治史的一次再梳理，力求跳出传统的新旧党争之说，重新分析熙丰变法到靖康之变的政治文化和政治体制，提出不少真知灼见，给笔者启发甚大。全书一共分六章，第一章“元祐政治路线的确立”，第一节首先讨论了新法实行十

几年后，凡是参与新法或是与新法有所联系的，无论传统上的“旧党”苏轼等，还是“新党”蔡确等都对新法产生了反思，尝试改造新法，对新法进行调和。同时作者依据一些墓志对基层官员的态度，进行了分析，这些史料往往以一种赞赏的语气描绘传主平心以待新法。反映出反新法者接受了新法推行的现实，并看到了其合理性，同时也反映出熙丰时代新法已经成为常态，是基层官员的日常事务。当然因为司马光一生中很少履历地方，大多数时间不是在洛阳修书，就是在中央任官，所以对新法了解不多，因此也最为仇恨新法。而太皇太后曹氏与太后高氏，并非如史料中描绘的那般仇视新法，实际她们深居后宫，对新法并不了解，而只是根据对人物的好恶而倾向于某方官员，而司马光等人因拥立英宗而获得了高氏的倾许，仁宗后曹氏则在濮议时司马光等人极力调和，并将曹氏的利益放在首位，故亦倾向司马光等人。这里笔者有一个小小疑问，司马光等人是在英宗入继仁宗之后有重大作用，但在随后的“濮议”中，司马光是作为反对英宗称生父为“皇考”一派的，实际上与英宗产生了冲突（即作者所言代表死后英宗利益的英宗后高氏），那么面对这双重矛盾，何以高氏就选择了对英宗有功同时又反对过英宗的司马光等人了呢？这一节简述了神宗死后，各种人物对“变法”的态度，就多数人而言，自然完全没有必要站在正方或是反方，他们只是政令的奉行着，法之新旧其实并未构成太大困惑。但是政治轴心太皇太后高氏、司马光恰恰是“少数派”。第二节则具体的探讨了司马光的“政治主张”与“政治设计”，一般而言，传统学界看法是司马光是史学上的大家却是政治上的庸才，元佑入朝除了废掉新法而外无一作为，但是作者则认为司马光其实是有一套具体的政治主张的，而这一套政治主张则随着朝政的变换而有所增补，大抵如下：第一，君主是政治秩序的重中之重，也是一切政治更张的起点。“夫治乱、安危、存亡之本源，皆在人君之心。”第二，强调政治体是一个等级、权责分明的有机体系，任何一个部分，包括君主在内，都有自己特定的职责，不能越俎代庖。（此主张是从熙丰变法之后，经历神宗“大作为，不听劝”而形成的）。那么如何维持这看似矛盾的两点主张呢？一个就是提倡多元意见，一个就是提倡以德行为先的官僚选任。特别是对德行的强调，成了消弭政治争议副作用的有效手段。这里作者归纳出了司马光在元佑政治的建设性，即一个理想的君主可以保证政治正确，一个多元意见并存的政治局面可以保证君主不选择歧路，德行为先的选材策略可以保证多元意见不伤害政治秩序的稳定。有人认为全面废除新法可能带来后患，但司马光则认为“天若祚宋，必无此事。”第三节则讨论了元佑垂帘体制的运行。元佑垂帘体制是与司马光的改革中枢宰执相互为表里的。神宗元丰年间改革官制，强调三省分班奏事，分割宰相的权力。元佑三省制，则是改为同取旨、聚议，“三省事通为一处”，类似于之前的“中书门下”体制。同时，高氏与司马光创立了“平章军国事”与“平章军国重事”的宰相制度，“平章军国重事”文彦博“一月两赴经筵，六日一入朝”，置之百僚之首，“以镇安四海”。同时除吕公著为“平章军国事”，使其“二日一入朝”，位皆在宰相之上。“重事”与“事”一字之差，所领权限也大为不同，文彦博只是参与朝廷大事如祭祀礼仪，高官除授，边防军事等事。而吕公著则参与朝中大小政务，入朝的频率也比文彦博要高，虽然文彦博地位居于其上，但实际权力则在其下。这时的中枢宰执实际上变成了一种层级鲜明的中枢权力格局，而与之相配合则是女主垂帘这一非常之举。女主高氏垂帘基本继承了仁宗母亲刘氏的垂帘仪制，但“延和殿视事”则由六日一入改为“二日一入”，与“平章军国事”吕公著双日入朝的频率相当，最终形成了三省同进呈、共聚议、宰相之上设“贵官”的方式，突破了元丰三省制，在最高层政治体制中形成了一种有差等、有序列的权力格局。正是这种格局保证了高氏和司马光对于政策走向的掌控。第二章为“元佑政治的展开与危机”。第一节重新剖析了传统意义上的“新旧党争”和邵伯温所言的“洛蜀朔”三党分裂的观点，指出实际上的言官背景复杂，绝不可简单的邵说或新旧说来划分，如苏轼与程颐两位旧党领袖在朝中活动也多受言官抨击，而这种抨击也是在“安静”的主流政治氛围下的一种反映。因此作者认为，元佑时期层出不穷的“朋党”是某些政治诉求所导致的“党名”，而非实际的政治集团。也正是因为这些诉求的多样性，政治分裂显得细碎而没有严整的阵线，也更难化解，极大的冲击了司马光生前的构想，实际上也部分冲击了元佑政治路线的政策层面。元佑危机则是在司马光高氏相继去世，哲宗亲政而暴露出来的，那么高氏生前的部署则已有了调和之意，引入了部分立场模糊的宰执如郑雍等，而当时的宰相团体也有了分化，有主调和有主清算，苏辙为了调和所引的“杨三变”“两来”等人也成为了后来首倡“绍述”之人。第三章则是哲宗亲政与政治文化的嬗变。作者着重分析了哲宗本人在经筵时期所努力扮演的角色与亲政后实际表露出的感情，来表现出对旧党“圣人化的君主”的反抗，也标志着旧党理想君主的塑造彻底失败。第二节则论述了哲宗在位期间对“文字”的重视，通过“编类章疏”和设立“看详诉理文字所”来对之前立场模糊，或者“诽谤先帝”“毁新法”的官员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算。文字清算之广，士大夫得罪家七百八十。这样的

政治整顿造成了“士类嬗变”，蔡京之流的出现也并非出人意外。小节中，作者谈到，哲宗亲政时代意味着宋代的“士大夫政治”在“君主与士大夫”两个方面的失败。这种失败指的是政治理念的失败，从君主方面来看，“致君尧舜”失败了，士人无法以自己的努力培养理想的君主，从士大夫群体的方面，“亦道德、同风俗”异化为政治清洗，士大夫群体的面貌也因此被扭曲。第四章则是“徽宗朝的权力结构”徽宗皇帝在中枢设立一种与之前平章军国事与重事的制度，即“公相”制度。公相就是以三公而兼任相任，总治三省之事。当然意义也如同前，徽宗找到了一种既利用蔡京的声望，又防止蔡京权力过大的一种方法。同时在象征方面，徽宗皇帝开始强调“御笔”“内批”“御笔手诏”的象征意义，以突出君主在整个政治生活之中的作用。作者详细区分了三者之间的区别，内批作为君主意见，往往由内侍撰写，发到三省，由宰相讨论，同意则撰写为正式文书，由政府下达。而手诏则是君主身边的学士撰写，直接下达，作为皇帝的命令之体。御笔则是徽宗朝开始强调一种文牒形式，但其实质与之前的内批无区别，行下方式也是通过宰相三省而发，但徽宗皇帝通过御笔达到了强调自身的作用，并且颁布了“违御笔法”，突出了皇帝的不可抗性。第五章则讨论了徽宗朝“应奉”，第六章是讲“道教、礼乐、祥瑞与徽宗朝的政治文化”，两章合起来讲比较便于理解，实际上徽宗的“应奉”就是为了实现徽宗的“政治理想”的一种经济手段，如花石纲、江南应奉所等，从而超越“父兄之治”。第五章详细考证了徽宗朝的敛财之举，对内对外所费皆由蔡京等人所取，也可解释为何徽宗如此倚重蔡京等人。徽宗自称“道君皇帝”，利用道教来神化自身，从而达到理想之治。制作了各种礼乐器皿，祥瑞之物，用来构建当朝的祥瑞体系。在第五章里作者同时对“丰亨豫大”“惟王不会”两个政治口号进行了论述，实际上这两个口号代表了徽宗朝政治的追求，是“理想的君主”“理想的大臣”“理想的统治成效（天下之人豫悦）”也就是极盛之时。徽宗朝君臣通过一开始的政治实践发现了实际上的圣治难以达到，但呈现圣治是可以做到的。所以这一切一切都是服务于呈现圣治这一政治目标，也可以解释了为何徽宗朝修建了大批的福利机构。当然通过敛财来达到的这一目标是儒学复兴运动背景下的追求三代之治的一种异化，异化为追求政治形象工程的结果。在全书的结语，作者讨论了皇权的属性，作者提出了一个观点，即皇权属性极其复杂，至少也要从君主的权力与权威两方面来考虑，并不能简单的讲皇权加大，缩小，这都是从一方面观察而得出的偏颇论点，以后的研究应该深入到皇帝权力的组成、性质、资源、运用方式等方面，只有这样才能对中国古代王朝体制的内涵有贴切的认识。

章节试读

1、《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的笔记-第1页

元祐政治路线的确立

#笔记#方诚峰先生认为，高氏本身对新法并没有明显的抵触倾向，她选择司马光是由于在英宗继统中司马光的出力这一层渊源，不应该把她视为“反变法”代言人。

#笔记#方认为，司马光的政治设想，从仁宗英宗上君主奋起关键在君主，转而神宗时强调君主与官僚结合的政体的完整性，强调上下等级秩序稳定的运作。提倡多元意见与官僚选任，是司马光元祐施政的两大支柱。经历过英宗神宗时的“挫折”，他开始侧重政治体的整体性，强调发挥君主之外的政治系统的有效性，他尤其认为保证政治体中各种意见的多元化，不会破坏稳定反而有拨乱反正的效果，并强调人才（的德行）。

2016.2.29第二章

元祐政治的展开与危机

#笔记#蔡确的车盖亭诗案，不仅仅因为他是新党（源于新旧之争）和“策立之功”【此处了解不多，需补习】，更重要的是，睡在蔡确的贬死，一大批温和派人物也被贬，再度确认了调和统治集团内部分裂的失败，力求肃清异论，司马光的设想失败了，旧党中统一队伍的激进思路取得胜利。

#笔记#

*御笔与之前的内批类似（即属于内批性质）有时会越过宰执直付有司，但主要还是与之前的内批一样，沿袭内批的流程，不应该将它看做越过二府的“非法”命令。它由皇帝、内夫人，有时也由宦官（临摹皇帝字迹）批出。“奉御笔”是徽宗朝省札中常见的形式，并非越过宰相机构（即并非皇帝直接指挥有司）它与圣旨的区别是从时间和权限上极为突出君主个人在命令发布中所起的作用。表达君主权威的政治姿态，从“奉圣旨”到“奉御笔”，最大的变化有两点：一是必须以瘦金体行出，而是有各种严格的禁令强调御笔的不可抗性。

*手诏：由翰林学士草制，是体重之诏，属于翰林内制，讲究遣词造句。

二者区别，例如，皇帝批示学士院降不允诏，这是“内批”；学士根据皇帝内批之意，拟成手诏颁降。

。

*御笔手诏：手诏性质。强调皇帝亲手书写。

#笔记#在经历过北宋仁宗朝以来的儒学复兴运动和神宗朝以来的政治改革之后，政治与社会秩序究竟要呈现出什么样的景象，取决于徽宗朝的作为。徽宗的最大挑战是，如何才能超越父兄？

经历了儒学复兴运动，传统的五德始终、讖纬、封禅等政治文化和符号走向了末路，士大夫通过金石学等获得了对三代的更深刻的理解，消解了三代的神秘性，儒学本身无法再满足徽宗朝强调君王和王朝神圣性的需要，道教之流趁虚而入。

徽宗与蔡京进行过一系列经济政治改革，但发现实际上的圣治很难达到，于是转而追求追求“呈现”圣治，呈现自身所达到的高度：君主本身是有神性的，其统治就是圣治，当代即是圣时。并为此而利用道教，建立了一套以王朝礼乐建设所产生的一批器物为核心的祥瑞体系，突出圣治。

儒学复兴所追求的三代之治，即理想的社会政治秩序，最终异化为政治形象工程。

*****结语*****

1. “后变革时代”对熙丰及司马光等人设想的异化。

政治变革改革思想已占据了主流，有了意识形态的支柱，就可以以各种形态成系列地出现。而这个过程中最大的危险不在于变革的夭折或党争，而是由于改革思想既无法抛弃却又无法通过常规途径来实现因而出现的且逐步深入的对于原除政治理想的异化。

2徽宗朝：支持“变革”的意识形态的穷途末路，新一轮调整的临界点。

《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

2、《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的笔记-第120页

看看“小人”、“奸臣”和“君子”的对比吧曾布：“近经服药，再伤动化，固须如此。然不可劳动，自延和至崇政甚远。”

哲宗：“亦不妨，欲更一两日后殿视事。”

曾布：“更三五日亦无妨。”

哲宗：“不妨。”字里行间的温情即使已过千年仍能感受到

先是，颐赴讲，会上疮疹，不坐已累日。退诣宰相，问曰：『不上御殿，知否?』曰：『二圣临朝，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当独坐。且上疾而宰相弗知，可为寒心。』翌日，吕公著等以颐言奏，遂诣问疾。

再看看“君子”们的表现，呵呵

皇帝只要还是个人我想没有人会愿意与下面的“君子”为伍吧

3、《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的笔记-第123页

宋哲宗的病情，遗精情况严重，和年轻的光绪很类似，法国医生对光绪的诊断报告是不是可以作为宋哲宗病情的参考，估计是年轻过劳皇帝的通病？

4、《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的笔记-第91页

方诚峰的新书其实暗含一个有意思的观点，神宗去世，如果不是英宗的老婆神宗的老妈高太后（因为英宗上位的事情和保守派司马光有过关键的交集，但神宗朝无法干预朝政，所以没有行政层的政治根基）还没死并且哲宗年幼的话，反变法的极端派一点上台的机会都没有

5、《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的笔记-第94页

第二章第三节第四节甚佳，李碧妍的书展示了作为官员的高适，第三节则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官场老油条——苏辙（朱熹对这位官僚虚伪一面的批评可是一针见血啊）。

第四节写了召述的“群众”基础，以哲宗朝祭祀为视角展示了王安石变法在思想上给当时的年轻人/官员带来的巨大影响力，哲宗亲政新政复活指日可见了。

本书立足政治史，视角尽管有所不同，但精彩程度堪比李碧妍的危机与重构

《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